

《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》

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弘扬正确二战史观

张士伟

“战争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...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了《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》(以下简称《新编》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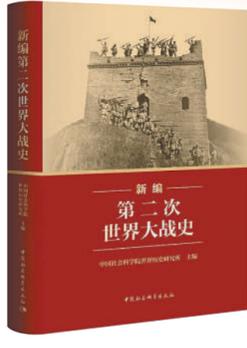
《新编》明确指出了中国战场为东方主战场，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。中国抗战开始时间最早，持续时间最长，处境最艰难，牺牲也最大。

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。按照1937年的比价，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，间接经济损失

5000亿美元，若以黄金计价，相当于今天的60万亿美元，这是一笔极为惊人的数字。毫无疑问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，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。

《新编》广泛挖掘中国人民支援全球各大战场的史实，梳理中国人民对于其他战场的支援，这是过去的著述较少涉及的。尽管抗战任务艰巨，中国人民仍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其他战场。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支持朝鲜独立、派军入缅作战以外，中国人民还积极参与了发生在欧洲的战争。

重视欧美之外的国家与民族的二战经历，讲述亚非拉可歌可泣的抵抗故事。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亚非拉的二战故事被世界所遗忘。实际上，其精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美国



《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》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和苏联等大国。二战期间，仅有4200万人口的英属非洲殖民地贡献了约40万名士兵。英国第14集团军中的第81师和第82师为非洲师，他们甚至赶赴缅甸战场与日本法西斯作战。非洲还提供了巨额矿产。亚洲太平洋方面，1940年9月，法属新喀里多尼亚人民选择在正义一边，发动政变，支持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。

《新编》全面探讨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，将

论述角度延伸至过去较少关注的国际经济领域。在战后秩序中，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中的份额位于前四，在战后初期世界政治与经济领域均确定了大国地位。这一地位的获得，并非是来自别人的赐予，而是源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要以史为鉴，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。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，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。从370多年前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，到160多年前《日内瓦公约》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；从80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，到70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。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。

(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序与跋

一朵花开了两次

乔叶

按照以往编选散文集的习惯，我把本书的篇章做了分辑。分着分着就觉得，其实是不大好分的。每一篇都如同一棵小树，树与树之间虽然有行距，俨然独立。但树与树之间，于地面之上枝叶相拂，于地面之下根须相系，着实是难剥难离。

比如“土地上”这一辑里，《土味儿》《蒹葭》等，貌似都是与土地相关，可土地是那么辽阔丰饶，简直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寓言。在“我是一片瓦”这一辑里，瓦，扇子，指甲草，爆米花，等等，虽然也都是像是在写物与事，可物与事中怎么会没有人呢？还有“在月光下奔跑”这一辑，固然是在写亲人，而我的亲人们都生活在土地上，生活在与乡村密不可分的物与事中。

比如棉田。我刚开始学习小说写作时，就在一个短篇里写到了。前些年我还写过一个童话，写小女孩朵朵在旷野中寻觅自己的智慧之星，夜宿在了棉田里。在准备这部书稿时，我又打捞出一个小细节：有一次我在棉田里睡着了，母亲来棉田里找我，找到后我们母女边聊天边走回家去。这情形如此寻常，但4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再度想起，方才读懂了母亲彼时过山车般的心境，她呼唤我时的惊慌恐惧，看到我时的愤怒叱骂，回家路上的家常闲谈，所有这些，都意味着母亲的爱。那时幼小的我，怎么可能懂呢？而多年后，在写下《海一样的棉田里，我像只船》的这一刻，我开始懂了的时候，顿时觉得那天的暮色震耳欲聋。

还有奶奶。我写得最多的亲人就是奶奶。她仿佛是一本怎么读也读不完的书。《我是一片瓦》里有她，《扇子的事》里有她……任我的年少岁月翻了多少个筋斗云，也翻不出来她的手掌心。那么厚实广袤的手掌心，我怀疑自己原本也不想翻出去。

“我们小时候”，这丛书的名字起得好。想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“我们”，也都有自己的“我们小时候”，其间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同。若有相同，就让经验拥抱。若有不同，或可参差对照——好像用不着这个“若”，相同和不同都一定有。不同之处多在表象，相同之处多在内心。做此判断的依据很简单：都曾经是孩子，都曾有童年。据说花朵们刚发芽时样貌最相近，我们的童年可不就是人生的花朵刚刚发芽时？

说到花，我常常会想到《朝花夕拾》这个美妙的书名。每每读到鲁迅先生为《朝花夕拾》写的序，我都觉得很会心：“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唯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”

我也愿意被这样的记忆哄骗一生。清晨时开的花于黄昏时去拾起，正如那些阔别已久的往事，因为难以忘怀，便在过去多年后，让它们在回望、回顾和回想中徐徐回归，让它们在字里行间被赋形，被重新检视，被呈现笔端，和现在的自己久别重逢。

当然，此花已不同于彼花。写作让一朵花开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当年，第二次是在当下。在历久弥香的气息中，我一瓣瓣描绘出心中花朵的模样。而于纸上绽放的花比开在枝上的花有着更漫长的芬芳，且一旦落到了纸上，花就再也不会败。

所以，写作真就是朝花夕拾，真就是这样一件迷人的事啊。(作者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。此文为《太阳落在了哪座山》一书后记，本版有删节。)

叶蓓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

儿歌，点亮童年夜空的星辰

金波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妈妈朗诵民间童谣的声音很是悦耳。对年幼的孩子来说，童谣的声音大于内容，孩子可以不懂唱的是什么，但那韵律与节奏足以感染我们。培养孩子热爱母语，最有趣的教材莫过于此。因此，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时，我就认定儿歌在儿童文学中有着特殊的艺术价值。

赵震的这本儿歌集，便打开了这个“先声夺人”的匣子。书名“北斗在天”以悠扬的开口音韵，渲染出一种辽阔的诗意，寓意着孩童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向往。儿歌的单元名也充满音乐感和游戏性，全然符合一个孩子的性情——“苹果树下过家家”，是天真的日常；“瓜儿藤上不结瓜”，是打破常规的想象；“荡到云上看小鸟”，是无拘的探索，无不透露出作者自然、自在、自由的情致。这样的情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艺术风格。

为孩子们创作儿歌，我们时常借鉴民间童谣。在形式音律上，《北斗在天》就很好地汲取了传统童谣的艺术养分。《桃花开》《屋檐下》等儿歌，日常天然，朗朗上口，可以读出传统童谣典型的音韵、意趣。但在今天，儿歌的创作似乎也有了更加丰富的题材。我们环顾一下自己所处的大千世界，除了花

草树木、鸟兽鱼虫等自然万物，还有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围绕着我们。《蛟龙出海上》《高铁高》等儿歌便是这样敏锐、新鲜的尝试，它们透过孩童之眼，轻巧地触发了当下的新事物、新领域、新题材，字里行间又不至于亲率真、惬意快活，令人欣喜。

古人称童谣是“天地之妙文”。我想，这妙就妙在它不训诫、不说教，给孩子一个好的心态，给孩子一个快乐的表情。赵震的《北斗在天》正付出着这样的努力。我想说，儿歌创作是一项充满爱与智慧的事业，愿这些儿歌如北斗星辰般点缀于童年的夜空，伴随孩子们走过岁月长河，成为一生中柔软、最明亮的记忆。

(《北斗在天》：赵震著，陈天雪绘；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)



本版邮箱 dushu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任一帆 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用想象预演未来

评长篇科幻小说《行歌三叠》 徐彦利

王晋康长篇科幻小说《行歌三叠》由其短篇《一生的故事》扩充而来，在保留原故事轮廓基础上，深化主题并创新了叙事结构。一场时空旅行，关系着两代人的命运，瑰丽绚烂的科幻奇想与生死离别的人生境遇交织在一起，深邃而悠远。

24世纪的青年戈亮，为消灭掌控人类的人工智能“大妈妈”，乘坐时间机器回到21世纪，试图阻止科学家陈影的研发以改变人类历史轨迹。但这一过程中，戈亮意外与陈影相爱，放弃了计划，两人还婚育生子。之后，穿越时空的戈亮变成量子状态，只能用强烈的意念对抗“弥散”，但他并未返回自己的时代，而是如影子般默默守护妻子。

错综曲折的故事，指向科幻的两个重要话题。

一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。开篇之初，作者便提出人工智能是人类助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。作为人工智能，“大妈妈”提高了人类的生活品质，却又导致人类学习能力、创造能力下降。对于这样的人工智能，听之任之还是彻底清除？戈亮对“大妈妈”的敌意，陈影对它的防范，都体现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早期态度。作者在字里行间则展示了乐观与豁达，人工智能并非洪水猛兽，它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。人类不应将自身的退化归咎于人工智能，而应自反思维。如同不主张“杀死大妈妈”的玛丽，不要图消灭人工智能，而是发起移民运动，准备在新的星球建设新的家园，重启人类的创造力。而“大妈妈”也悟出与人类的共存之道，不是言听计从，而应互爱共生，于是主动前往息壤星，将地球交还给人类。这种理解合作、互相成全，为现实中我们与人工智能的相处带来诸多启示。

另一个是时间。时间构成了历史，历史则是时间的总和，这里面有科幻创作的无穷矿藏。在戈亮的穿越冒险中，过去、现在、近未来和远未来并置，读者可以站在时间轴上的任意一点向前回忆或向后憧憬。无论戈亮所处的24世纪，还是陈影所在的21世纪，彼此互为因果，又互为开端，有时甚至形成充满悖论的闭环。多重人称视角交织切换，使情节之间相互补充、嵌合，勾勒出完整故事。作者还运用倒叙、插叙、预叙、补叙等多种方法，将一段段切开的时间碎片连缀起来，叙述层次鲜明而多元。

在复杂的时间链条中，历史会不会因时空旅行发生偏离？作者给出了清晰有力的解答：历史的结局，不会因为时间旅行而改变，人类注定要完成应有的突破。

读罢本书，眼前似乎映现一个画面：人类沿着无尽的时间长河踽踽前行，边走边唱，歌声刚劲。也许科幻的意义就在于此，看到未来已来，也回望来时的路，每一步都要坚定、乐观地走下去。

(《行歌三叠》：王晋康著；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。)



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：吴真著；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兵火危难，书籍在劫难逃。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，中国计有3744家图书馆，至1937年底，损失达2166家之多，损失图书接近9000万册。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的官方数据，遍布全国的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灭顶之灾，其损失之巨，至今无法统计。

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，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：走，还是不走？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，而且他分藏于上海各处的古籍有近2万册。最终，他选择留下。由此有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。

在上海“孤岛”的前4年，郑振铎耗心力于

搜罗文献，与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的诸同仁抢救下1.5万余种宋元善本、明清精槧；后4年，他隐姓埋名，典衣节食，尽力于保全、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。

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隐秘行动，每一个师团均配备“兵要地志资料班”，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，拟出“接收”(没收)清单，一俟占领，立即展开掠夺。在日军劫掠之后，大量的劫余古籍流散至上海，由于战局动荡不安，贪腐盛行，书画、古籍、古董作为“硬通货”也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储值、生财的主要选择，旧书业因此畸形繁荣。

虽然名义上是为国家保存文化，但在国家力量暂时缺席的上海租界，郑振铎的文化抢救工作，只能遵循旧日书业的商业规则，以个人名义进行秘密交易，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。每一次出手，都是非常时期斗智斗勇的博弈求生。他始终处于被“围猎”的危险境地，其行动，其研究，其藏书，一直受到日本军界、情报界、学术界的密切注目。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，时时刻刻都

新书架



《改变人类进程的科学研究》：苗千著；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本书通过采访世界顶尖科学家，深刻揭示科学的飞跃和进步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面貌和历史进程。



《向上》：何常在著；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小说讲述90后青年们投身雄安新区建设，创造精彩人生的故事。

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

吴真

在恐怖中，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”，又一次次地“从劫灰里救全了它，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”。

这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，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谍战，归根结底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保卫战。

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一书讲述的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暗战，讲述郑振铎在险恶环境中，在多方势力的博弈中，在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，抢救保全文物古籍的故事。通过解读日记、汪伪的档案，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、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录，我们得以走近这场黑暗中的周旋与打鬥。

烧书以求逃，售书以求生，抢救书籍以抗日，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。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，也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，记录下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。例如，对于之前常被描绘成唯利是图的书贾群体，郑振铎说：“我很感谢他们，在这悠久的8年里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

过一句话。”书贾不仅掩护了郑振铎，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。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伙计，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近3万册古籍，利用民间商运方式秘密运至香港，穿越军事铁幕，打通了一条隐秘的“孤岛书路”。

钱振东《书厄述要》指出：“文化之于国家，犹精神之于形骸。典籍者，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。”“书厄”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大量图书亡佚残缺的劫难。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导致的触目惊心的“书厄”，郑振铎坚信：“我们的民族文献，历千百劫而不灭的，这一次也不会灭亡。”他生前经手搜购、抢救、保存的古籍，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古籍基本库藏。在他导夫先路的中国俗文学研究、版画研究、文物研究诸领域，今天的研究者所研究的珍贵文献与文物，许多都是当年郑振铎奋力搜求保全下来的。

时隔将近一个世纪，回望这场“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”，回望抗战时期郑振铎艰苦卓绝的书籍事业，更能深刻体会到它之于文明传承保护的意义。